

An Over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ilitary Strategic Layou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ina

新中国成立后 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经验与启示

★ 郝敬东 刘璐 张丽霞

摘要: 军事战略布局是实施战争行动、遂行战略作战任务的支撑和依托,是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国家安全威胁牵引军事战争布局的调整,国家利益是作出调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军事力量是调整的物质基础,地缘条件对调整具有基础性作用,战略文化交流对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新中国 军事战略布局 调整优化 经验 启示

中图分类号: E297.5 E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8)02-0033-04

军事战略布局作为对军事力量的全局性配置活动,是进行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的支撑和依托,是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体现和落实。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有利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迅速集聚战略能量,形成有利战略态势,为实施战争行动、遂行战略作战任务提供力量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多次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对打赢信息化战争、落实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优化军事战略布局”^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牵引整个军事战略布局调整优化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同样也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特别是主要战略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直接牵引整个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在中南、西南、华东、西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尚有100多万残余力量,仍控制着台湾、海南岛,对新生政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面对南急北缓的安全形势,毛泽东专门对全国“兵力配置”进行统一筹划,1949年10月31日即明确指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③这一筹划的特点:一是以防范帝国主义国家侵犯或袭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战略重点;二是采取防御态势;三是按华北、华东、华南三个战略区配置兵力;四是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机动力量,并将其配置在便于向各个战略方向机动的位置上。这一军事战略布局突出了主要战略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兼顾和关照了其他战略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国家安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由东南方向转向东北方向,中

* 本论文是全军军事类研究生资助课题《军事战略布局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JY044。

[作者简介] 郝敬东,国防大学军事战略博士研究生;刘璐,61646部队助理研究员;张丽霞,61646部队工程师。

① 《中国的军事战略》,载《人民日报》,2015-05-27(10)。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3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共中央决定“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①，将军事战略布局重心由东南沿海转向东北方向，军事力量由东南方向向东北方向调整，将驻守河南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立即开赴东北，^②加上东北的部队，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东北兵力已达到25.5万余人，为初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迅速调整全国军事力量配置，有效应对了国内国外安全威胁。新形势下，国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要综合考察利益冲突、政策企图、力量对比、部署态势等，全面比较国家所面临的敌友形势、强与弱、战与和等，判明威胁性质、轻重缓急，把利益矛盾最大、有攻击能力、有明显政策企图和部署行动的对手看作主要威胁，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布局的直接依据。

二、国家利益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曾深刻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它们的利益有关。”^③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维护国家利益是军事力量的基本使命或根本职能，军事战略布局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在一定战略空间范围内对军事力量的全局性配置，其调整优化必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6次划分调整军区（战区），都是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为基本依据，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1950年，军队围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的使命任务，结合国家行政区的设置，第一次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6个一级军区即大军区”^④，有效维护了新生政权。1954年，依据敌人对中国领土可能进攻方向，将原来6大军区调整为12个。1956年，为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实现国家统一，增设福州军区。1967年，为应对中苏、中印、中蒙边境紧张局势，加强统一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分别将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和成都军区。1985年，中共中央判断对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的威胁减小，将军区调整合并为7个。2016年，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⑤，以有效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新形势下，国家利益正逐步超出国界，海洋利益、空间利益、海外利益等在国家利益全局中的地位凸显，要求军事战略布局跟上国家利益拓展的步伐，既能维护传统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又能维护海洋、太空、网络等新型领域利益以及海外利益，为国家和平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和保障。

三、军事力量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⑥。同样，军事力量也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物质基础，它的强弱对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具有重要影响。军事战略布局要通过相应的军事力量存在来体现，通过军事力量的运用来实现，其调整优化必须符合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否则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就是失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上，充分考虑军事力量实际，以有利于发挥人民解放军力量优势作为重要着眼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台湾、朝鲜、越南三个方向面临军事威胁，考虑发挥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优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决定调整军事战略布局，将军事力量配置重点“由解放台湾转为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⑦。因为，如果在越南作战或进行岛屿作战，人民解放军空中和海上力量不足，而在

^①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② 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1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⑤ 《习近平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载《解放军报》，2016-02-02（1）。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97页。

^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178页。

朝鲜同美军作战,是“一个最有利于发挥中国陆军优势的抉择。”^① 正所谓“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1964年至1980年,中国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在全国开展了以国防工业、战备工程为基础的“三线”建设。^② 实践表明,这一“备战优先”、首先加强力量建设的军事战略布局,虽过度判断战略威胁,出现了偏差,但有效保障了中国几十年的安全。

四、战争形态的演变是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推进器

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作战方式作为战争形态的内核,使技术成为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加速剂”“催化剂”,军事战略布局与科技因素之间形成一种本质联系。

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后,战场迅速向核领域拓展,战争形态演变为核战争,主要国家竞相发展核武器。1955年,作为战略大家的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第二年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④ 可以说,核技术的发展推动战争形态向核战争演变,加速了军事战略布局向核领域的拓展,推进了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⑤ 新形势下,随着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战场也逐步向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新型领域拓展,战争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捷足者先登”,要着眼未来战争形态特别是信息化战争,尽早谋划、及早实施,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形成有利战略态势,构建一个涵盖陆海空以及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多领域、大立体、全方位的军事战略布局。

五、地缘条件对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具有基础性作用

军事战略布局是在“一定战略空间”范围内对军事力量进行全局性配置。因此,地缘条件对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具有基础性作用,特别是一个国家在地球上的自然分布即国家地理位置,对整个军事战略布局的基本走向产生几乎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威廉森·默里所指出“在战略上,如同在地产经营中一样,有三个要念念不忘的关键考虑: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军事战略布局要以地缘条件为客观基础,利用不同地理空间提供的自然条件,对军事力量进行最佳配置,构建最优化的军事战略布局,以在战略对抗空间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这与中朝的地缘关系密切相关。朝鲜半岛处于典型的边缘地带范围内,是连接亚洲大陆和日本诸岛的天然通道,是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战略缓冲区,关系到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就军事战略而言,“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⑥,朝鲜半岛不仅是中国向海洋防御的屏障,同时又是列强登上中国大陆的跳板,朝鲜问题应看作与中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说明抗美援朝的决心时指出的“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⑦ 这个“利益”就是在地缘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利益。所以,

① 徐焰《解放后重大战略决策的历史回顾》,6页,北京,国防大学训练部,2003。

② 参见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⑥ 《周恩来外交文选》,1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17页。

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维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新形势下，尽管武器装备的远程打击能力、战略投送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以及在太空、网络等新型空间中作战，使地缘条件对军事力量配置的影响相对下降，地面作战的作用相对减弱。但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无论在太空作战还是在网络空间作战，“要想搬动世界首先需要一个立足点”^①，这就不能排除地缘条件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新形势下调整优化中国军事战略布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所处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形成充分利用有利地缘条件的军事战略布局。

六、战略文化传统对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战略文化传统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②。同样，对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表明，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一直是在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进行战备，主要围绕巩固新生政权、防敌突然袭击。1963年毛泽东在开展“三线建设”时曾指出“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③，这些主张防御、强调有备无患的思想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国防御性的战略文化传统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针对军事战略布局进行多次调整优化，都离不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孕育，军事战略布局已深深地根植于国家、民族的战略文化传统之中。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指出：“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也正如托马斯·克利瑞指出的“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于道家 and 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④因此，只有揭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略文化传统的特性，才能真正准确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军事战略布局的走向。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传统是“影响”而不是“决定”军事战略布局，它不可能取代安全威胁、国

家利益、军事力量、战争形态、地缘条件等因素对军事战略布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有效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形势日趋多元复杂，国家利益正逐步超越国界，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略空间不断拓展。军事战略布局应立足国情军情，充分借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经验，围绕打赢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前瞻性地调整优化，构建新型布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3] 《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 [5]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 《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肖石忠】

^① [美] 约翰·柯林斯 《大战略》，31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② 李际均 《论战略文化》，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4）。

^③ 陈夕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3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④ 李际均 《论战略文化》，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4）。